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缓和作用与拓展

作者：徐荣华，丁毅，张跃，郭永玉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是解释个体特别是弱势者接受社会不平等不公正，进而表现出维护既有系统这一反常现象的代表性理论，自 Jost 和 Banaji(1994)提出以来，收获了较多关注，20 多年间积累了不少研究证据。该综述从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缓和作用出发，归纳了三类防御机制，进一步探索了可能得边界，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最后“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资源整合模型”，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整体而言，该文思路清晰，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组织和介绍前人研究，文献较充分，并且提出了整合性的新框架，是一篇能够给系统合理化研究领域有所贡献的综述。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帮助作者进一步完善论文：

意见 1：“缓和作用”是本文的题眼和核心，但文中对其的表述似乎有点问题：它有助于个体在压力情境中维护心理健康，降低负性情绪(如焦虑和抑郁)、提升正性情绪(如希望)并对生活境况更为满意(Jost, 2019)。从逻辑上说，降低负面情绪和提升正面情绪应该是途径，维护心理健康、对生活更满意是结果。可能需要调整语序以更符合逻辑：它有助于个体在压力情境中降低负性情绪(如焦虑和抑郁)、提升正性情绪(如希望)并对生活境况更为满意，进而维护心理健康。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您的表述更为准确，我们已在原文中调整了表述。具体修改见 1 引言第二段或下文：

该理论进一步指出，在面对社会不平等现状时，系统合理信念具有缓和作用(palliative function; Jost & Hunyady, 2002)：它有助于个体在压力情境中降低负性情绪(如焦虑和抑郁)、提升正性情绪(如希望)并对生活境况更为满意，进而维护心理健康(Jost, 2019)。

意见 2: 对于缓和作用的深入讨论，本文提到了短期积极、长期消极这个点。那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延伸：是否还存在表面积极、实际消极，以及个体积极、群体消极的“悖论”？这关乎到我们怎样看待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作用。以及维护所谓心理健康的代价，值得深思。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缓和作用这一名称最初来源于 Jost 与 Hunyady(2002)的文章，这一概念被用于解释人们(尤其是低地位者)饱受社会不平等的摧残，但仍然维护和捍卫系统合理性与公正性的怪异现象。研究者认为，合理化系统有助于个体应对不平等社会现实，即维持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名称中的缓和(palliative)事实上暗示了这一效应的非适应性特征(Napier et al., 2020)，也就是说，个体通过接纳“虚幻”的公正感以缓解负性情绪，就如同吸食鸦片(opiate)般，其代价巨大，不仅无法真正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在无意中维护了社会的不平等(Jost, 2019)。原文 4.2 部分对缓和作用的消极效应进行了论述，但篇幅有所局限。正如专家提醒，需要思考缓和作用在不同层面上的可能“代价”。因此我们对 4.2 部分进行了修改与扩充，整合过往相关证据，从 3 个维度，即个体、群体(群际)以及社会 3 个层面，更为系统地论述及强调缓和作用的消极效应。具体修改内容为见 4.2 部分或下文：

4.2 重视缓和作用的消极后果

尽管本文着眼于系统合理信念在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上的积极效应，但其消极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从防御路径的运作来看，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功能事实上揭示了这一效应的非适应性特征。也就是说，个体通过接纳“虚幻”的公正感以缓解负性情绪，就如同吸食鸦片(opiate)般，其代价巨大，这不仅无法真正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在无意中维护了社会的不平等(Jost, 2019)。本文强调，系统合理信念的这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群际以及社会 3 个层面，需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在个体层面，人们(尤其是低地位者)赞同系统合理信念可能面临着一种“双刃剑”效应的境况，即系统合理信念一方面有助于个体应对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其心理压力的直接来源(Jost & Hunyady, 2002; Jost, 2019)。例如，O'Brien 和 Major(2005)发现，若低地位者(黑人和拉丁裔)具有低群体认同感，则系统合理信念确实能够正向预测个体心理福祉(以自尊和抑郁为指标)；但若低地位者认同感较高，则系统与群体合理化两种动机间就发生了冲突，上述积极效应就发生了倒转。又如，Dover 等(2020)以少数族裔大学生为被试，发现倘若少数族裔大学生持续遭遇歧视威胁，高系统合理信念便会损害其心理健康。再如前文所述，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功能可能具有短期的积极效应与长期的消极效应。在群际层面，系统合理信念强化了群际刻板印象。研究

发现，低阶层个体如果认为社会体制是公平合理的，往往更倾向于偏爱高地位群体，即表现出外群体偏好(outgroup favoritism; Jost et al., 2004)，并且该现象多具内隐性质(Axt, 2018; Essien et al., 2021)。另一些研究则表明，高系统合理信念致使个体否认不公平事件并贬损受害者(victim derogation)，例如那些性侵受害者(Ståhl et al., 2010)、经济失败者(Kay et al., 2005)或灾害受难者(Napier et al., 2006)。在社会层面，系统合理信念同样具有广泛的消极社会影响，即它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高系统合理信念弱化了个体对于系统的负性情绪(如愤怒感)，导致民众更不愿意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现状，如支持再分配政策(Wakslak et al., 2007)、参与改善不平等现状的集体行动(Solak et al., 2021)或关注气候变化议题(Jylhä & Akrami, 2015)。

结合前文分析，事实上系统合理信念的消极效应主要源自其缓和作用，因为“缓和”仅仅起到的是麻痹自我的功能，而并不能够根本“治愈”不平等现状的病症(Napier et al., 2020a)。因此，这就提醒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若想要真正提升弱势群体的福祉，就不应使其依赖一种表面的、虚幻的系统公正(即依赖缓和作用)，而应当切实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最终使得弱势群体真正能够在公正、平等的社会中受益(即促进应对资源的获取)。

参考文献

- Jost, J. T. (2019).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263–314.
- Jost, J. T., & Hunyady, O. (2002).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11–153.
- Napier, J. L., Bettinsoli, M. L., & Suppes, A. (2020).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29–134.

意见 3: 论文的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如同样包含四个子部分，第 2 部分最后有小结，第 3 部分却没有（然而又有“综上所述”的内容）。

回应: 感谢专家对文章结构的提醒，我们在文中增加了 3.4 小结部分，并将相关内容移至该处。具体修改见 3.4 部分或下文：

3.4 小结

综上所述，基于防御动机的逻辑，研究者提出了影响缓和作用的情境、个体与时间边界，并为此提供了支持证据。但是，对于上述边界条件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反对证据。一项基于 18 个国家样本的纵向研究同时考察了国家不平等、社会地位以及时间跨度对缓和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具有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以及负向预测焦虑与抑郁情绪的积极效应，但这一效应并非暂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长期性(至少为 6 个月)；并且研究也未证实国家不平等程度(以 Gini 系数与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为指标)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调节作用(Vargas-Salfate et al., 2018)。此外，有研究考察了缓和作用在不同地位者中的效应差异，但结果同样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并未给弱势地位者带去更多的心理益处(e.g., Li et al., 2020; Sengupta et al., 2017)。上述研究证据揭示了缓和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境、地位以及时间一致性，这事实上挑战了系统合理信念仅作为防御动机起到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如前文所述，防御动机必然受到某些边界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暗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可能还存在某种非“防御”的路径。

意见 4: 图 1 作为作者提出来的整合模型，算是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否应该提升其地位，而不只是在 4.1 中出现？

回应: 感谢专家对本文理论价值的认可，我们将该内容置于 4.1 部分而非将其作为文章一大点，有下述两点原因：第一，模型中有关“应对”路径的文献数量较为单薄且多为间接证据，没有足够的体量支撑其单独成为一大点。第二，“应对”路径及模型的提出，最主要功能在于对“防御”路径的局限之处(如遇到的挑战或矛盾的证据)进行补充与拓展，其仍然是推测性的与尝试性的。本文的核心与重点仍然是介绍缓和作用的机制及边界条件，并试图对此进行可能的拓展和展望。经过作者们反复思考，仍认为将它置于 4.1 部分作为对前文的补充与拓展可能更为恰当。如果审稿人有进一步疑问，我们欢迎您进一步赐教。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引言第二段最后两句需要补充相关文献（领域扩展的文献和考察缓和作用这一效应内在机制的文献）。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已在文中补充上相关文献，具体修改见 1 引言第三段或下文：

缓和作用的提出，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对该效应进行探究，并将其从社会经济领域拓展至了诸如种族、性别和性少数等领域(e.g., Bahamondes et al., 2020; 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Hammond & Sibley, 2011; Napier et al., 2010; O'Brien & Major, 2005; Vargas-Salfate, 201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也有一些研究开始考察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e.g., Bahamondes et al., 2020; Li et al., 2020; McCoy et al., 2013; Vargas-Salfate, 2019)。

意见 2: 2 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作用：三种心理防御机制是作者概括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作者提出的新观点，所以最后一句使用“提出”不合适。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已将“提出”修改为“总结”。具体修改见 2 心理机制第一段或下文：

因此，立足于对以往文献的整合，本文总结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缓和作用)的三类心理机制：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以及否认或淡化威胁。

意见 3: 2.2 部分第一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Landau 等人(2015)总结了四类补偿性控制策略……”这四种补偿性控制策略放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与后面“就系统合理信念而言……”有什么内在逻辑吗？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原文中提出 4 类补偿性控制策略事实上是想说明系统合理信念属于其中的“明确结构确认”这一策略，以此证明其补偿性控制的功能。如专家所以，原文提出 4 类策略，与后文似乎存在割裂，甚至显得有些突兀。因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删除了这句话。

意见 4: 2.3 部分第二段“……也是对系统公正性的威胁。”这里有文献支撑吗？为什么这么说？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已补充上参考文献。这句话的逻辑是，如果个体相信系统是公正的，那么对系统公正性的威胁(文中为歧视)会导致个体产生防御反应，进而否认或淡化威胁。具体修改内容见 2.3 部分第二段或下文：

歧视不仅是对个体福祉的威胁，也是对系统公正性的威胁(Napier et al., 2020b)。

意见 5: 3 部分“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者主要考察了两类重要的边界条件，其一为情境边界，

即社会不平等；其二为个体边界，即(低)社会地位(包括财富、性别和种族等)。”这里需要补充参考文献。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已补充相关文献，具体修改内容见 3 边界条件第一段或下文：

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者主要考察了两类重要的边界条件，其一为情境边界，即社会不平等(Hadarics et al., 2021; Onraet et al., 2017; Sengupta et al., 2017); 其二为个体边界，即(低)社会地位，包括财富、性别和种族等(Hadarics et al., 2021; 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2019)。

意见 6：3.3 部分第二段“此外，有研究考察了缓和作用在不同地位者中的效应差异，但结果同样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并未给弱势地位者带去更多的心理益处”删除“位”。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已删除多余文字。

意见 7：4.1 部分“.....系统合理信念作为心理资源.....”有文献支撑吗？有的话请补充。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鉴于审稿人 3 的意见，4.1 部分已基于新的“防御一应对整合模型”调整了原有的逻辑与表述，该内容已删除。本处专家提到的将“系统合理信念作为心理资源”，原本为文章的推测，即依据资源的定义，认为系统合理信念具有促进其他资源的功能必然也是一种心理资源。

.....

审稿人 3 意见：

本研究具有较好的创新性，提出了新的关于系统合理信念的理论模型。但仍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需要作者注意：

意见 1：第一，引言最后一段指出已经有研究者对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解释系统合理信念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质疑”，但未展开阐述都有哪些质疑。建议在引言中对类似“质疑”等问题的实质性内容进行简要阐述分析，以利于读者把握文章的观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已在文中增加了此部分内容，对具体质疑进行了简要阐述，具体修改内容见 1 引言最后一段或下文：

此外，随着研究证据的不断积累，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仅基于防御视

角进行解释面临重重挑战：研究发现缓和作用的边界效应并不一致(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研究者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成因提出了质疑(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有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与某些应对资源间具有积极关联(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 Samson, 2018; Li et al., 2020)。

意见 2：第二，在引言中，作者未能厘清“缓和作用”与“防御”的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什么概念与“资源”相对。换言之，没有能够构建一个清晰的理论概念架构。比如，“缓和”这一术语具体来自于哪个研究？它如何能代表“缓解、补偿、缓冲”三类不同的防御机制？换句话说，从 2 的第一段末尾中可见，作者认为，本文的第一个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三类心理防御机制，但，是否能用“缓和”来概括“缓解、补偿、缓冲”三种作用，因未见分析，所以仍然存疑。（与上一条批注意见密切相关。）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意见，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章的概念及其架构。

首先，什么是系统合理化理论所谓的缓和作用(palliative function)?缓和作用这一名称最初来源于 Jost 与 Hunyady(2002)的文章，这一概念被用于解释人们(尤其是低地位者)饱受社会不平等的摧残，但仍然维护和捍卫系统合理性与公正性的怪异现象。研究者认为，合理化系统有助于个体应对不平等社会现实，即维持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名称中的缓和(palliative)事实上暗示了这一效应的非适应性特征(Napier et al., 2020)，也就是说，个体通过接纳“虚幻”的公正感以缓解负性情绪，就如同吸食鸦片(opiate)般，其代价巨大，不仅无法真正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在无意中维护了社会的不平等(Jost, 2019)。

其次，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系统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与缓和作用(palliative function)之间有什么关系?个体认可与捍卫系统现状，其目的在于应对由社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各类压力，即体现为威胁与防御的心理过程(Jonas et al., 2014)。从这一过程来看，系统合理化就是一种心理防御的过程，是一个动机的过程；而高系统合理信念则是这一防御动机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态度或信念。系统合理化作为应对威胁的防御反应，其必定具有积极的心理效应，这一积极效应就是缓和作用。

再次，“缓和”与“缓解、补偿、缓冲”三种作用间的关系?再次感谢专家对该问题的强调，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了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发现原有的表述确实存在含糊与不准确之处。第一，原文中将“缓和作用”视为心理防御机制并不妥当，如前文所述，系统合理化才是个体应对威胁的防御反应，而缓和作用是这一防御机制的功能，表现为降低负性情绪、提升正性情绪并对生活境况更为满意。第二，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以及缓冲外部

威胁感知也并非“心理防御机制”，而是系统合理化这一防御机制的心理后果，更为准确的说是处于心理防御与其积极心理效应间的“中介机制”。如果用图释义，为威胁—>防御(系统合理化)—>系统合理信念—>中介机制(缓解、补偿、缓冲)—>积极心理效应。系统合理信念到积极心理效应构成了缓和作用，而“缓解、补偿、缓冲”则构成了缓和作用的内在机制。第三，自缓和作用提出后，研究者就对这一现象及其机制进行了探究与解释，但目前相关研究是比较零碎的，缺乏整合。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事实上就在于整合了相关研究并概括出了3种差异性的机制，即所谓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以及缓冲外部威胁感知(注：“缓冲”这个词的使用并不准确，在意见6中对其进行了解释与修正)。

最后，“防御”是解释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唯一解吗？该问题用于回应专家对于概念框架的强调，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修正了原有的模型。这一“动机性”的解释事实上面临着一些挑战：研究发现缓和作用的边界效应并不一致(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研究者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成因提出了质疑(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有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与某些应对资源间具有积极关联(e.g., 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 Samson, 2018; Li et al., 2020)。这些质疑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明晰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一积极效应是否仅可被解释为“防御”过程的后果？再次感谢专家对概念框架的提醒，我们发现原有的框架(模型)中，与“防御”对应的是“资源”，这并不妥当，因为防御是一个动机过程，而资源是一类心理结构。借助于临床心理学中对适应性过程(adaptational process)的研究(Cramer, 1998; Kramer, 2010)，研究者事实上区分了两类个体对待逆境(adversity)的反应，即防御(defense)与应对(coping)。防御是无意识的、被动的且缺乏意向性的反应，而应对则是意识的、主动的并聚焦于问题解决的(Cramer, 1998)。这两类反应模式为我们理解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也就是说，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同样可以被分为两个相对应的过程，其一为“防御”，其二为“应对”。鉴于此，本文重新调整了概念框架，提出了防御—应对整合模型(defense-coping model)，并以此作为文章新的概念基础。

综上，我们对1引言第二段、第三段以及2心理机制第一段进行了修改，具体参见正文或下文：

(1 引言部分)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个体支持与捍卫当前社会系统，满足了自身三类需要，其一是认识性需要(epistemic need)，以降低不确定性与含糊性；其二是存在性需要(existential need)，以缓解威胁与不安全感；其三是关系性需要(relational need)，

以维护社会联系与共同现实感(Hennes et al., 2012; Jost, 2019)。换言之,个体接纳系统合理信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维护社会现状的动机性需要(Kay & Jost, 2003)。该理论进一步指出,在面对社会不平等现状时,系统合理信念具有缓和作用(palliative function; Jost & Hunyady, 2002):它有助于个体在压力情境中降低负性情绪(如焦虑和抑郁)、提升正性情绪(如希望)并对生活境况更为满意,进而维护心理健康(Jost, 2019)。简而言之,个体认可与捍卫系统现状,其目的在于应对由社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各类压力,即体现为威胁与防御的心理过程(Jonas et al., 2014),而缓和作用则表现为这一防御过程的积极心理效应。

缓和作用的提出,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对该效应进行探究,并将其从社会经济领域拓展至了诸如种族、性别和性少数等领域(e.g., Bahamondes et al., 2019, 2020; 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Hammond & Sibley, 2011; Napier et al., 2010; O'Brien & Major, 2005; Vargas-Salfate, 201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也有一些研究开始考察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e.g., Bahamondes et al., 2019, 2020; Li et al., 2020; McCoy et al., 2013; Vargas-Salfate, 2019)。尽管目前已有少量文献对缓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和介绍(e.g., Napier et al., 2020a),但缺乏对其具体心理机制的梳理与概括。此外,随着研究证据的不断积累,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仅基于防御视角进行解释面临重重挑战:研究发现缓和作用的边界效应并不一致(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研究者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成因提出了质疑(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有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与某些应对资源间具有积极关联(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 Samson, 2018; Li et al., 2020)。鉴于此,为进一步厘清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间的积极关联,本文首先立足于对以往文献进行整合,概括和阐明系统合理信念缓和作用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然后分析被动防御路径的局限性,提出潜在的主动应对路径,并最终构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一应对整合模型(defense-coping model),以期明晰研究问题并启发未来研究。

(2 心理机制):日常生活中,个体通常面临各类压力或威胁事件,并由此引发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这将导致个体产生心理防御反应。系统合理化理论指出,个体认可与捍卫系统现状,其目的就在于应对由社会威胁所产生的各类压力,以图缓解负性情绪并维护心理健康(Jost & Hunyady, 2002)。也就是说,个体接纳系统合理信念具有维护心理健康的积极功能,即缓和作用。那么缓和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如何维护心

理健康？现有研究者对该问题的回答通常是零碎的，缺乏系统分析与梳理。因此，立足于对以往文献的整合，本文总结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缓和作用)的三类心理机制：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以及否认或淡化威胁。下文将分别论述这三类机制。

参考文献

- Cramer, P. (1998). Coping and Defense Mechanisms: What's the Differ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6(6), 919–946.
- Jonas, E., McGregor, I., Klackl, J., Agroskin, D., Fritsche, I., Holbrook, C., ... & Quirin, M. (2014). Threat and defense: From anxiety to approach.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9, pp. 219–286). Academic Press.
- Jost, J. T. (2019).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263–314.
- Jost, J. T., & Hunyady, O. (2002).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11–153.
- Kramer, Ueli. (2010). Coping and defence mechanisms: What's the difference? – Second act.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83(2), 207–221.
- Li, W., Wu, J., & Kou, Y. (2020).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life satisfaction of high-and low-status people in Chin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5), 588–596.
- Maraş Taşkin, G. & Şingir, H. (2022). Optimism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Tendenc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 *OPUS Journal of Society Research*, 19(47), 477–489 .
- Napier, J. L., Bettinsoli, M. L., & Suppes, A. (2020).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29–134.
- Owuamalam, C. K., Rubin, M., & Spears, R. (2019). Revisiting 25 years of system motivation explanation for system jus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system attitud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362–381.
- Rubin, M., Kevin Owuamalam, C., Spears, R., & Caricati, L. (2023).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system attitudes (SIMSA): Multiple explanation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by the disadvantaged that do not depend on a separate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e.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
- Samson, K. (2018). Trust as a mechanism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PLOS ONE*, 13(10), e0205566.

Vargas-Salfate, S., Paez, D., Khan, S. S., Liu, J. H., & Gil de Zúñiga, H. (2018).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in 18 coun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3), 567–590.

意见 3: 第三, 2.1 第二段和下一段的内容如果作为“缓解”机制的例证出现, 显得比较松散, 不够聚焦。我的意思是, 作者没有点明这两部分例证与前述缓和“意识形态失调”之间的逻辑联系。比如这一段的所介绍的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不一致, 是属于“意识形态失调”的一种亚型? 那么下一段所述的“互补性刻板印象”跟“意识形态失调”之间又是什么逻辑关系? 也是一种亚类型? 需要加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梳理。这种增强逻辑关联的话, 要么是段首句, 要么是末尾句的位置, 都比较合适。目前看不到。后面那一段关于“互补刻板印象”的内容, 与本文主题之间的关系更加不明确。说明作者缺少必要的整合和述评。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原文中 2.1 第二段与第三段的主要作用是用于为“缓解意识形态失调”提供例证。意识形态失调体现了个体关于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不一致, 因此这必然导致个体产生防御反应, 即接纳系统合理信念(杨沈龙 等, 2018)。在系统合理化理论看来, 能够起到维护系统合法性的信念或意识形态都可被笼统称为系统合理信念(Jost & Hunyady, 2005), 因此无论是该处提到的精英主义信念(meritocracy belief)或互补刻板印象(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事实上都可被视为一种系统合理信念。原文的逻辑是, 假若意识形态失调能够导致个体接纳相关系统合理信念, 那么可以认为系统合理信念就具有缓解形态失调的功能。但正如专家所提醒的, 原文在处理机制与例证的关系时比较松散, 显得有些脱节, 也就是说没有处理好例证与机制间的关联, 这会导致读者产生困惑。在原文基础上, 我们重新修改了相关表述, 并增加了一些关联句: 第一, 我们把 2.1 第二与第三段进行了合并, 事实上文章中提到的精英主义信念、经济系统合理信念或互补刻板印象都具有降低意识形态失调的功能, 即缓解自身关于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不一致, 因此它们作为例证的功能是等质的, 原文中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反而容易产生误解。第二, 在段落句末增加了总结句, 增强了机制与例证间的逻辑关联。具体修改内容见 2.1 部分第二段或下文: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接纳系统合理信念是缓解意识形态以使其社会理想与现实相一致的有效手段, 这进而促使个体产生低负性情绪与高幸福感。例如, 精英主义信念(meritocracy belief)认为现存系统的财富差异主要源于绩效(merit)因素, 即个人能力与努力(Jost & Hunyady, 2005), 因而更赞同当前社会现状与精英主义理想间的一致性。

作为广泛根植于各类国家社会体系中的系统合理信念，精英主义信念与个人福祉密切相关。一项基于欧洲 36 个国家样本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信奉精英主义信念的个体更快乐，对生活也更满意(Hadarics et al., 2021)。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精英主义信念与自尊和身体健康间的积极关联(McCoy et al., 2013)。相似的，经济系统合理信念(economic system justification)同样反映了人们认可当前经济系统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并认为个人的经济成功只取决于个人的绩效因素。Goudarzi 等(2020)通过实验探究了该系统合理信念与负性情绪间的关联。研究发现，高经济系统合理信念者，在观看了无家可归者的采访视频(即经济不平等事件)后，更不容易产生失调反应，因而不仅口头报告出了更少的悲伤、愤怒以及厌恶等负性情绪，同时也体验到了更少的生理唤醒(以皱眉肌激活水平与皮肤电导水平为生理测量指标)。当研究者将被试置于日常生活情境时，结果同样表明，在遭遇生活中偶遇穷人或富人的不平等事件时，高经济系统合理信念弱化了被试的负性情绪反应。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互补性刻板印象在缓解意识形态失调中的积极心理功能。互补刻板印象(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是一种在维持原有社会群体刻板印象的基础上，将互补性美德归于弱势群体，并将相应恶习归于优势群体的策略(Kay et al., 2007)。支持互补刻板印象与维护现存系统具有密切关联。研究表明，当被试暴露于互补的地位刻板印象时(如贫穷但快乐、富裕但痛苦)，表现出了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Kay & Jost, 2003)。相似地，对男性能动特质(agentive trait)与女性公共特质(communal trait)的互补性强调，也使被试更为认可当前社会的性别公正性(Jost & Kay, 2005)。因此，研究者推测既然互补性刻板印象具有系统合理化功能，并有助于缓解歧视现实与平等理想间的矛盾关系，就应该能够促进个人幸福感。研究证实，善意性性别歧视(benevolent sexism)，一种看似积极但家长式的，承认女性善良与温暖的同时也认为其应受男性的保护的互补性刻板印象(Glick & Fiske, 1996)，正向预测了女性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Napier et al., 2010)，且系统合理信念在这一积极效应中起到了中介作用(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Hammond & Sibley, 2011)。由此可见，缓解意识形态失调是系统合理信念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 杨沈龙, 郭永玉, 喻丰, 饶婷婷, 赵靓, 许丽颖. (2018). 系统合理化何以形成——三种不同的解释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2238–2248.
- Jost, J. T., & Hunyady, O. (2005).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意见 4: 第四,“威胁缓冲”这个词序不符合中文阅读习惯,更符合中文的表达应该是“对威胁的缓冲”。或者是“缓冲威胁”。即动宾结构。

回应: 感谢专家对文章语词使用准确性的提醒。

意见 5: 第五, 2.3 最后一段并未真正解释是什么样的“潜在积极效应”。本段末尾也没有呼应段首句提出的“潜在积极效应”,建议进行扩充。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原文中“潜在积极效应”事实上就是指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积极心理效应”,用词不准确,并且该词与后两句威胁的“消极效应”放在了一起,可能产生了歧义。因此,我们做了如下修改:第一,把 2.3 最后一段第一句中“潜在积极效应”改为“积极心理效应”。第二,把该句拆分为 2 句话,一句总起系统合理信念防御威胁的积极心理效应,另一句描述系统外部威胁的危害。具体修改内容见 2.3 部分最后一段或下文:

最后,另一些研究则注意到了系统合理信念在防御系统外部威胁中的积极心理效应。系统外部威胁不仅直接损害了个体的心理健康,也间接威胁了系统的稳定性与合法性(Napier et al., 2006)。

意见 6: 第六,与前两个机制相比,缓冲外部威胁这一机制的提出显得比较牵强。其与前两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清晰。因为外部威胁在前两条中也是会出现的,不独属于第三条。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该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先重新审视“缓冲”这一概念。所谓“缓冲”(buffer),本质上是指某一心理结构具有的弱化外部威胁消极心理影响的功能(Lambert et al., 1999)。也就是说,系统合理信念防御外部威胁的积极心理效应都能够被笼统称为“缓冲”。对于您所说“外部威胁在前两条中也是会出现的”,即缓冲外部威胁可能囊括了前两种机制(缓解认知失调与补偿性控制),我们表示赞同与认可。事实上,该问题也反映了目前关于缓和作用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即研究者简单地将系统合理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功能都归因于其缓冲威胁的作用(e.g., Hammond & Sibley, 2011; Jost & Hunyady, 2002; Napier & Jost, 2008; Napier et al., 2020; Spaccatini & Roccato, 2021),而未能够有效区分其具体机制(这事实上是本文的贡献)。在该意义上,缓冲威胁的概念实质上就等同于缓和作用。如专家所言,原文中使用“缓冲外部威胁”容易导致混淆,与前两种具体机制区分不开,但这主要是所用名称的

缘故，原文事实上是介绍了一种区别于缓解与补偿的机制，即否认或淡化威胁(denial or minimization of threat)。否认或淡化威胁这一机制使个体将威胁排除意识之外，换言之，防止个体感知到外部威胁的存在。理论上，这一机制有别于缓解意识形态失调或补偿控制感缺失，但在实践中，这些机制可能混杂在一起(有关这部分内容，见 2.4 小结)。因此，为了阐明该机制的内容，我们做了如下修改：第一，将标题名称改为“否认或淡化威胁”；第二，对段落内容进行修改，调整了易引发歧义的词汇或句子，使该部分围绕“否认或淡化威胁”进行论述。具体修改内容见 2.3 部分与 2.4 部分或下文：

2.3 否认或淡化威胁

个体于生活世界中遭遇的各类威胁，既包括了发源于社会系统内部的威胁，如歧视或经济不平等；又包括了源自社会系统外部的威胁，如恐怖袭击或自然灾害等社会自然事件。缓和作用的第三种心理机制体现为防止个体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即起到否认或淡化威胁(denial or minimization of threat)的作用。

首先，聚焦歧视(discrimination)这一系统内部威胁的研究为这一机制提供了支持证据。歧视是对某一群体成员的消极态度、判断或不公平对待，弱势者(女性、少数族裔或 LGBT 群体)由于其自身身份或地位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更可能遭遇到来自其他群体成员的歧视，当个体感知到这些歧视时(即歧视知觉，perceived discrimination)，可能因此产生各类身心健康问题(Pascoe & Smart Richman, 2009)。歧视不仅是对个体福祉的威胁，也是对系统公正性的威胁(Napier et al., 2020b)。为防御来自歧视的负性影响，系统合理信念通过构建心理屏障，阻碍或歪曲了个体对于歧视的感知。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是导致个体否认或淡化歧视的重要前因。McCoy 和 Major(2007)通过一项混乱句子任务(scrambled sentence task)启动了女性被试的精英主义信念后发现，当被试在实验任务中申请“职位”但被拒绝时，更不愿意将这一消极结果归因于他人的性别歧视，同时在阅读性别歧视文章后也感知到了更少的性别歧视。一项纵向研究也证明少数族裔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导致了其后更少的歧视知觉，但反向的关系并不成立(Bahamondes et al., 2021b)。研究进一步表明，系统合理信念否认与淡化歧视的作用具有维护个体身心健康的功能。例如，Napier 等(2020b)发现女性对其群体歧视的否认或忽视都与个人福祉具有积极联系。Bahamondes 等(2020)以 LGBT 群体为样本也发现，高系统合理信念的同性恋者更少感知到针对其内群体的性污名(sexual stigma)，因而更少受到心理困扰的影响。

其次，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具有防御社会不平等威胁的效果，并将其用于解释意识形态的幸福鸿沟(happiness gap)效应，即保守主义者为何更为幸福的问题。Napier 与 Jost(2008)指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conservatism)的核心功能在于合理化社会不平等现状，并由此削弱其负性心理效应。换言之，保守主义者较自由主义者更为幸福的关键缘由可能在于他们更倾向于否认和淡化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研究证据显示，无论使用美国样本或跨文化样本，政治保守主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并以系统合理信念为中介；纵向数据显示，从 1974 至 2004 年随着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以 Gini 系数为指标)的持续攀升，自由主义者幸福感持续降低，但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却未受影响(Napier & Jost, 2008)。后续研究也多次验证了幸福鸿沟效应的存在(e.g., Butz et al., 2017; Newman et al., 2019)。

最后，另一些研究则注意到了系统合理信念在防御系统外部威胁中的积极心理效应。系统外部威胁不仅直接损害了个体的心理健康，也间接威胁了系统的稳定性与合法性(Napier et al., 2006)。在 2005 年飓风卡特里娜灾害中，研究者发现，尽管美国政府在灾后救援过程中暴露出了种种弱点，民众仍然通过捍卫社会现状、指责受害者或接纳刻板印象等系统合理化方式，否认了这一威胁对于美国社会系统合法性的侵害，以此重建关于社会系统的公正性信念并缓解情绪困扰(Napier et al., 2006)。2008 年 5·12 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研究者发现，若受灾者相信所处世界系统是公平公正的，则更少感知到源自地震灾害的不确定性威胁，进而更能够有效应对由此引发的抑郁与焦虑情绪，并感知到更多的希望感；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该积极效应在相对脆弱的女性或失去亲属、好友的群体中表现更强(Xie et al., 2011)。类似的，Vasilopoulos 与 Brouard(2020)发现，在 2015 年巴黎恐怖袭击背景下，那些更赞同社会系统公正性与合理性的个体，更少受到恐怖袭击的影响，即表现出了更低的恐惧与愤怒情绪以及更高的希望感。上述研究表明，通过否认或淡化系统外部威胁，高系统合理信念有助于个体在威胁情境中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2.4 小结

总的来说，上述三种机制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心理机制，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特点与适用范围。具体而言：(1)缓解意识形态失调从个体关于现存系统实然与应然信念的矛盾出发，突出了系统合理信念在维护个体内在认知一致性中的积极作用，即通过将社会现状视为理想状态，个体得以缓解负性情绪；(2)补偿个

人控制感缺失则聚焦于系统合理信念在补偿个人控制感并满足个体确定性需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提供稳定的外部秩序与个人控制感，系统合理信念消解了个体因控制感缺失而引发的心理困扰；(3) 否认或淡化威胁强调系统合理信念为个体构建心理屏障，这一机制过滤并弱化了个体对于外部威胁的感知，进而在威胁情境中维护心理福祉。

虽然上述 3 项机制在理论上存在区别，但在实践中却紧密交织。以性别歧视为例，一方面它可能因凸显性别不平等而激发女性的意识形态失调(Hammond & Sibley, 2011)，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而损害个人控制感(Fischer & Holz, 2010)，此时女性个体对社会系统的合理化既能够缓解认知失调，又能够重建控制感，同时形成认知屏障弱化对性别歧视的知觉，最终降低个体的焦虑抑郁情绪并促进生活幸福感。

参考文献

- Lambert, A. J., Burroughs, T., & Nguyen, T. (1999).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The Role of Just World Beliefs and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6), 643–656.
- Hammond, M. D., & Sibley, C. G. (2011). Why are benevolent sexists happier? *Sex Roles*, 65(5–6), 332–343.
- Jost, J. T., & Hunyady, O. (2002).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11–153.
- Napier, J. L., Bettinsoli, M. L., & Suppes, A. (2020).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29–134.
- Napier, J. L., & Jost, J. T. (2008). Why are conservatives happier than liberal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6), 565–572.
- Spaccatini, F., & Roccato, M. (2021).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exism: Individual Sexism Buff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sure to Workplace Sexism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exuality & Culture*, 25(3), 767–785.

意见 7：第七，通读 3.3 部分之后，我认为仅从存在矛盾的研究证据角度，就推论认为是因为还可能存在“非动机”的机制，这个推论过于牵强。至少在这一段中，应当对为什么矛盾的研究证据都指向于“非动机”，进行充分分析和解读。后面到了 4.1 部分，作者在这里提出应区分动机和认知成分，也显得突兀。

回应 1：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原文的意思是说，缓和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境、地位以及时间的一致性，这实质上是对防御路径的挑战，因为防御必定受边界条件的影响。但由此推论还可能存在“非动机”的机制，确实过于牵强而且也并不准确。事实上，基于上述“防御与应对”新的框架，这里更为准确的推论应该是认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可能存在某

种非“防御”的路径，由此引出后文对“应对”路径的讨论以及最终构建出完整的模型。因此，我们对 3.4 部分最后一句进行了修改：

上述研究证据揭示了缓和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境、地位以及时间一致性，这事实上挑战了系统合理信念仅作为防御动机起到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如前文所述，防御动机必然受到某些边界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暗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可能还存在某种非“防御”的路径。

回应 2：关于为何需要在 4.1 部分区分动机和认知成分。感谢专家的提醒，我们发现原文在处理该部分内容时确实有些突兀，且行文冗长。但我们认为这部分不可缺少且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在组织 4.1 部分的内部行文逻辑时，是考虑先从对防御路径的质疑出发，通过回应质疑最后建构出模型。区分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和认知构成虽不是本文重点，但具有以下两点价值：第一，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构成(即系统合理化)，在系统合理化领域中是一个热点问题(张跃 等, 2022)，甚至有研究者直接对该动机的存在提出质疑(e.g., Owuamalam et al., 2019)，对系统合理化动机的否认事实上就是对整个防御动机路径的否认，因此我们必须对该问题进行回应。我们的观点是，系统合理信念同时存在动机与认知构成。第二，这虽然是我们的推论，但我们认为认知与动机构成在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上可能存在差异。我们推测，假若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构成在维护心理健康中扮演了应对威胁的暂时性的、被动性的心理防御功能，那么其认知构成，即对社会系统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判(胡小勇 等, 2016)，可能具有一种较为稳定的、主动的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这是基于这一推论，我们得以继续寻找证据，建立后面的模型。综上，我们保留了该部分内容，并对该段落进行了删减和修改，将关于“测量”这一无关的论述移至 4.3 部分，并调整了其他的表述，具体修改内容见 4.1 部分第二段或下文：

第一，个体对系统公正性的感知并不仅仅是某种防御动机的结果，也可能体现了个体非动机过程的产物。系统合理信念作为对于社会系统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判断或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态度或信念。有研究者指出，系统合理信念能够体现为个体纯认知过程的结果，例如对于客观现状的真实反映(Owuamalam et al., 2019; Thomas, 2021)或源自某一基本认知过程的副产物(Hussak & Cimpian, 2015)。当然，本文并不否认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来源，而是提出仅将系统合理信念视为动机的产物是片面的，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与认知构成进行概念性区分有助于理解其后续积极心理功能。本文推

论，假若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构成在维护心理健康中扮演了应对威胁的暂时性的、被动性的心理防御功能，那么其认知构成，即对社会系统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判(胡小勇等, 2016)，可能具有一种较为稳定的、主动的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

参考文献

-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3), 271–289.
- 张跃, 丁毅, 杨沈龙, 解晓娜, 郭永玉. (2022).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心理科学进展*, 30(7), 1637–1650.
- Owuamalam, C. K., Rubin, M., & Spears, R. (2019). Revisiting 25 years of system motivation explanation for system jus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system attitud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362–381.

意见 8: 第八，图 1 的提出，给我的感觉是 4.1 这一部分创新步子比较大，但实际的论述内容非常少，我甚至建议把本文拆分成两篇，分成两个主题进行。这部分的创新可以单独成篇。后面 4.2、4.3 这两部分所述的内容也都是其他的问题，与前面的主题关系不大，不建议放在本文中。

回应 1: 非常感谢专家对本文创新性的认可。我们考虑把 4.1 部分“应对”路径的提出与模型的构建放置于该处而非单独成篇，有下述 3 点原因：第一，“应对”路径是对“防御”路径的补充与拓展。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对“防御”路径的局限之处进行补充，以此更完整地诠释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在该意义上，两者是紧密关联的，它们是对同一主题(系统合理信念如何维护心理健康)的探讨，单独成篇反而割裂了其内在逻辑。第二，“防御—应对模型”的提出具有揭示过往研究不足、指导未来研究方向的功能。由于受到系统合理化理论对于防御动机的强调，过往关于缓和作用的研究并没有能够从理论及实践上区分防御与应对这两个差异性的过程，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该模型的提出有助于反思过往研究的结论并解释其矛盾的结果。此外，该模型也能够为未来研究提供指导，有利于研究者在建立假设时推理出更为准确的假设，也有利于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究防御与应对这两个过程的联系及区别。第三，有关“应对”路径的文献数量单薄且多为间接证据，没有足够的体量支撑其单独成篇，因此我们认为将其置于讨论部分作为对前文的拓展可能更为恰当。综合上述论述以及对原有模型的修正，我们保留了 4.1 部分并基于新的模型对其进行了修改(由于修改内容较多，请直接查看文章 4.1 部分中对应的修改部分)。如果审稿人有进一步疑问，我们欢迎您进一步赐教。

回应 2：有关 4.2 与 4.3 部分的必要性。4.2 部分涉及对缓和作用消极效应的论述，“缓和”这一词的使用，就暗示了该效应的非适应性特征，即系统合理化的消极后效，这是相关领域关注的重点(Jost, 2019; Napier et al., 2020)，不可忽略，且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去除该部分将导致对缓和作用的论述不再完整，而且容易导致研究者对“缓和”作用产生误解，即认为其是适应性策略。因此，4.2 部分是重要且必要的，我们保留了该部分并参照了专家 1 的建议对其进行了强调与完善。4.3 部分是对上述模型的补充，也是对具体实证研究可操作化的建议。例如 4.3 部分提到的对系统合理信念测量的关注与建议，回应了 1)过往研究中对“认知”与“动机”的混为一谈，突显了区分两者的实践意义；2)提出一种更为可操作性的区分“认知”与“动机”的测量方式，以指导后续研究。4.3 部分的论述是对模型的补充及对后续研究的指导，因此经过作者们反复讨论，也倾向于选择保留。如果审稿人有进一步疑问，我们欢迎您进一步赐教。

参考文献：

- Jost, J. T. (2019).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263–314.
- Napier, J. L., Bettinsoli, M. L., & Suppes, A. (2020).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29–134.
-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在自检报告里提出，中英文期刊中都发表过类似的综述评论，希望作者能够在正文部分突出强调本研究与这些综述的区别之处、独创之处、推进之处。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在正文中进一步突出了本研究的区别、独创和推进之处。具体修改内容见 1 引言最后一段、4 拓展与展望第一段或下文(修改内容已用橙色标注)。此外，我们再次通读了全文，对少量有歧义或不通顺的字词或语句进行了调整。

1 引言

缓和作用的提出，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对该效应进行探究，并将其从社会经济领域拓展至了诸如种族、性别和性少数等领域(e.g., Bahamondes et al., 2019, 2020; 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Hammond & Sibley, 2011; Napier et al., 2010; O’ Brien & Major, 2005;

Vargas-Salfate, 201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也有一些研究开始考察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e.g., Bahamondes et al., 2019, 2020; Li et al., 2020; McCoy et al., 2013; Vargas-Salfate, 2019)。尽管目前已有少量文献对缓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和介绍(e.g., Napier et al., 2020a)，但内容较为零碎，缺乏对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的深入探讨和梳理。此外，随着研究证据的不断积累，仅基于防御视角解释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面临重重挑战：研究发现基于防御视角所预测的缓和作用的边界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研究者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成因提出了质疑(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有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与某些应对资源间具有积极关联(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 Samson, 2018; Li et al., 2020)。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揭示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积极关联，突破现有理论视角的局限，引导后续研究的方向，本文立足于对以往文献的整合，首先概括和阐明系统合理信念缓和作用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然后分析被动防御路径的局限性，提出潜在的主动应对路径，并最终构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应对整合模型(defense-coping model)。

4 拓展与展望

大量研究证实了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相关研究也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立足于对过往研究证据的梳理与整合，本文基于心理防御视角，概括并阐述了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即缓和作用)的 3 类作用机制，即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与否认或淡化威胁；以及影响缓和作用的 3 类边界条件，即社会不平等、社会地位与短期长期效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近来一些研究证据开始挑战防御视角的主流解释，并指出该视角无法完整揭示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因此亟待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基于此，下文首先对防御视角的批评进行了整理与回应，并试图通过构建防御—应对整合模型以期解决理论与研究间的分歧。此外，该领域还有一些其他关键问题值得研究者们关注。

第三轮

编委 1 意见：

建议进一步完善后发表：

(1) 系统合理信念这一主题，有鲜明的政治背景特征，因此，要在引证文献时，尽量明确主要文献和研究结果是在哪个国家，哪些群体下做出的研究，避免让人认为有关结果是普适的，从而造成误解和政治敏感性问题的。

(2) 文章过长，应控制在 1.4 万字内。

回应 1：感谢编委的提醒，我们同意您的观点。系统合理信念这一概念源于系统合理化理论，该理论从诞生到发展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特征(尤其是其与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紧密关联，见 Jost et al., 2004)。虽然本文论述的缓和作用在北美、欧洲或大洋洲背景下被多次证实，但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e.g., Li et al., 2020)，考虑到文化性差异，确实不能够简单地将其推广到国内，但我们认为本文提出的模型对于未来国内的相关研究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们重新修改了关于部分文献的引证，尽量明确了引证文献的国家与群体所属，并在正文中将相关内容标注为了“红色”。

参考文献

- Jost, J. T., Banaji, M. R., & Nosek, B. A. (2004). A decad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 quo. *Political Psychology*, 25(6), 881–919.
- Li, W., Wu, J., & Kou, Y. (2020).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Life Satisfaction of High- and Low-Status People in Chin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5), 588–596.

回应 2：感谢编委对文章长度的提醒，我们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剔除了某些不重要的引证，并简化了某些冗余的表述。目前文章总字数已在 1.4 万字以内。

编委 2 意见：文章的内容有价值，论述得也很清楚。同意发表。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